

18~19世纪 朝鲜使臣与清朝文人的交流

■ 韩荣奎 韩梅 ◎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本研究得到了 2007 年度韩国政府财源(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学术研究支援事业费用)的资助,是在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支持下进行的(AKS-2007-DA-2002)

18 ~ 19 世纪朝鲜使臣 与清朝文人的交流

韩荣奎 韩 梅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19世纪朝鲜使臣与清朝文人的交流 / 韩荣奎,
韩梅著.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670-0666-9

I. ① 1… II. ① 韩… ② 韩… III. ① 中朝关系—文化
交流—文化史—研究—18~19世纪 IV. ① K249.03
② K3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719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出 版 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appletjp@163.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传真)
责任编辑 滕俊平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8.125
字 数 150 千
定 价 20.00 元

邮政编码 266071

电 话 0532-85902342



Contents

第 一 章 绪言	001
第 二 章 燕行与燕行录——会友的记录	003
第 三 章 朝鲜燕行使节与清朝文人的交游	010
第一节 18 世纪朝鲜北学派的宿愿	010
第二节 19 世纪朝鲜京华士族的燕京体验	042
第三节 金正喜派译官与朴趾源后裔的燕行	074
第 四 章 18~19 世纪朝鲜使臣与清朝文人交流的特点与意义	094
附录 1 18~19 世纪燕行使团名单	097
附录 2 18~19 世纪朝鲜燕行录目录	116
附录 3 日本所藏 18~19 世纪朝鲜燕行录目录	122

第一章

绪 言

当初构思这本书时,考虑的是按照时间顺序对 18~19 世纪朝鲜使臣与清朝文人的交往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使其成为一部概论性质的纯学术性书籍。但是我们两个作者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想法发生了改变,将写作目标调整为撰写一部“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一定通俗性的教育类图书”。因为我们认为,这本书作为“韩国学企划项目”,属于“韩流”系列图书,而且在中韩两国同时出版,所以应该通俗易懂,成为一本大学生能够理解的“学术性教育图书”。因此,我们计划以“燕行”、“借助笔谈与诗文唱酬的交往”、“热情款待与深厚友情”等为核心,重点考察两国古代文人精彩、有趣的交游事例。

我们一方面整理两国文人交流的事实,一方面致力于发掘交流的具体情况。因为此前对两国文人交流的研究多以古代人员为主,根据他们的行踪进行探索,赋予一定的意义,侧重在文化领域阐释朝鲜社会对清朝文化的接受,所以,“北学”、“北学派”就成为了代表这种影响关系的用语。不过实际上友情和接待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文化和学术相比缺乏普遍性,而是具有相互沟通的性质。因此,本书将重点放在两个主体之间的友情及相互沟通方面,努力发掘和阐述表明清朝文人对朝鲜文人友情的事例。

出于这种目的,本书尽量捕捉那些富有特色、丰富多彩的友好交往事例,不仅对洪大容与严诚、金正喜与翁方纲等著名的事例加以介绍,也把那些虽然在文化史上所占比重不大或者不太知名但是其交往十分真诚、深入的事例尽量纳入

书中。例如，我们新发掘出李晚秀与张裕昆、金老商与张际亮的交游事例，其中的张裕昆和张际亮都是未能出仕的文人寒士，却与朝鲜使团成员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而且其交往过程也饶有兴味。

本书意图探讨两国古代文人多种多样的友谊，因此在不超越学术性的范围之内，尽量采取了灵活的叙述方式，换言之，为了突出双方文人的亲密交往，我们关注的是那些具体的细节。与此同时，我们还补充了与内容相关的各种视觉资料，努力使本书成为一本通俗易懂的读物。

第二章

燕行与燕行录——会友的记录

所谓“燕行”，是指朝鲜时代外交使团出访中国的首都燕京（即今天的北京）。燕行的首要功能是维护朝贡的政治外交关系，除此之外，它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也有重大意义。具体来说燕行是朝鲜与清朝进行贸易的重要方式，卞承业等很多译官通过燕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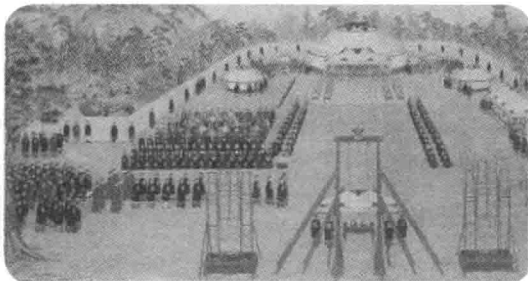
此外，燕行是朝鲜人体验并吸收先进文化的唯一渠道以及认识世界的窗口。因此，参加燕行的朝鲜文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燕行的体验和见闻用记录的形式保留下来。

从仁祖在位时期到朝鲜王朝末年的 250 多年间，朝鲜大约向清朝派出使团 500 多个。当清朝建都沈阳的时候（1637—1644），朝鲜王朝就每年定期派出冬至使、正朝使、圣节使、岁币使、年贡使几个使团；清朝迁都北京之后，从 1645 年开始，这些使团被统一为冬至使，每年定期派遣一次；从 1637 年至 1894 年，朝鲜使团共出使清朝 507 次，而在同一时期，清朝向朝鲜派出勅使 169 次。

一、使行的种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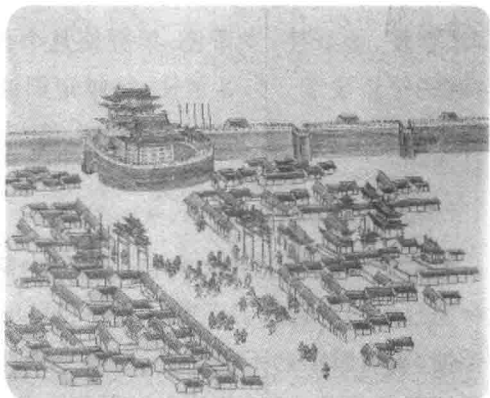
朝鲜出使北京的使团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定期使行和临时使行。定期使行有已经成为定例的三节年贡使和皇历贺咨使。三节使是在冬至时期派出的冬至使、祝贺新年的正朝使、祝贺皇帝和皇后生日的圣节使。年贡使是缴纳每年上贡岁币的使节，把三节使和年贡使合并在一起，就成为三节年贡使。自清朝迁

都北京的第二年——1645年起，正朝、冬至、年贡使三种使行不受原定日期的限制，通常在正月初一赶到，此外还有圣节使。清朝统治中原之后，对自身的实力更有自信，便减轻了朝鲜的朝贡负担，改变了制度，在大部分文献中，三节年贡使一般被记录为冬至使，每年阴历十一月出发，第二年四月回国。皇历咨咨使是将中国册历带到朝鲜的使行，简称为历行，每年八月出发，十月到达北京，将清朝的时限历带到朝鲜。



《万树园赐宴图》。描绘了在避暑山庄举行宴会的场景。1754年是乾隆皇帝即位第19年，乾隆皇帝为了庆祝蒙古族的归顺大摆筵席，清朝著名画家郎世宁画下了当时的场面。26年之后，朝鲜文人朴趾源也访问了“热河”。

临时使行中包括对清朝的政策或外交行动表示感谢的谢恩使，关于国家的重大事件向中国皇帝上奏或申请的奏请使，皇帝即位或70岁、80岁寿诞时派遣的进贺使，中国皇室有丧事时派遣的进慰使，国丧时上香的进香使。此外，辨诬使是清朝对朝鲜产生误解或者朝鲜发现清朝官方文献中有误时为了阐明事实所派遣的使节；问安使是清朝的皇帝出行前往先祖墓地所在的盛京等地时，朝鲜派往皇帝行宫进行慰问的使节；参核使是两国之间发生刑事案件时，为了解决问题，朝鲜向清朝指定的场所派遣的使节；告讣使是为告知朝鲜国王驾崩所派遣的使节。



《燕行图》。描绘了朝鲜使臣和随行人员正在走进北京城。藏于韩国崇实大学博物馆。

二、使团的组成

使团的正式人员由正使一人、副使一人组成,有时候仅仅有正使一人。但是赍咨行的任务如果不太重要,可以不派正使和副使,只派译官中人品和素质出众者出使。派遣使臣无论对清朝还是对朝鲜都是一种经济负担,因此双方经过商定,根据事情的重要程度和派遣的时期,采用通过定期使节携带有关书面材料和方物的兼行制。

按规定,定期派遣的冬至使人数一定要在每年6月15日确定,按照惯例,与冬至使相比,临时使节的官阶更高,正使通常任命丞相级的大臣或正1品的王族、宗室,副使是将副2品临时提拔为正2品的官员,书状官是从正4品临时提拔为副3品的官员。冬至使成员构成可参照表2-1。谢恩使、进贺使等表示感谢或祝贺的使臣常常由王室成员担任,而奏请或者辩诬等不仅限于礼仪还需要获得成果的使行,则选派名望很高、文采出众、办事能力很强的人员。

表 2-1 冬至使行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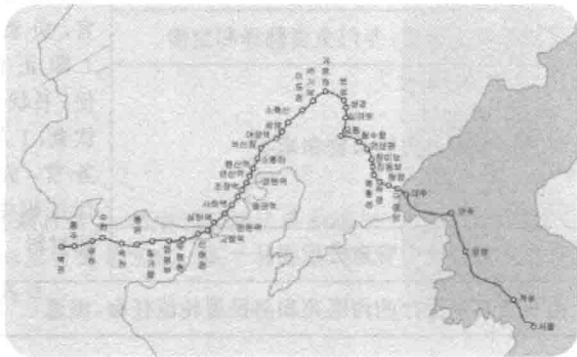
正使		1 人	正使是正 2 品临时提升为副 1 品派出,副使是将正 3 品临时提升为副 2 品派出,选拔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名士,是负责礼宾的象征性人物
副使		1 人	
书状官		1 人	是将正 5 品临时提升为正 4 品后任命,一般选拔在官员中声望较高、才学与人品兼优的人物,是使团的实际负责人,兼任大监之职,需要对一行人进行检查监督,每天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回国后向承文院提交报告
译官 (规定 总人数 为 19 人)	堂上译官	3 人	选拔译官中年龄最大且精通汉语、熟知接待之礼的人员,这个职位非常受重视,即便任职人员犯了重罪,在作为使臣出访中国或者接待中国使臣期间不予惩罚
	上通事	2 人	仅次于堂上译官,专门负责翻译和交涉
	押物从事官	8 人	负责向中国进贡的币物和米谷
	押币从事官	3 人	
	押米从事官	2 人	
	清学新遞儿	1 人	负责在燕行途中管理公用物品
医员		1 人	由负责宫中医疗的内医苑和惠民署轮流任命、派遣

续表

写字官	1人	负责在当地撰写向清朝朝廷提交的各种文书
画员	1人	负责描绘使行情景,描摹不能购买的图画或地图等,并学习新的绘画技巧
军官	共7人	正使带4人,其中必须有一人经书状官推荐。副使带3人,三使都推荐候选人员,通常都是前任或现任的武官,但是其中也有子弟军官或自辟军官,是从自己的晚辈亲戚中选拔的人员,以解旅途寂寞,并让这些人增长见识
偶语别差	1人	由司译院选拔派遣,目的是学习汉语等
湾上军官	2人	负责在燕行过程中为三使整理住处,管理使行所用的粮食,从义州人中选拔

三、使臣的住所

使节的住所在法令中有明确的规定，汉阳(今首尔)到义州是古代两国使臣的必经之路，因此宿舍建得很好，每隔一定距离就设有驿站，在景色优美的地方还建起楼阁，让使臣能够欣赏景色。饮食由附近郡县负责，食物的质量取决于郡县的财政和地方官的诚意。由于清朝在鸭绿江边到栅门地区留置空地，禁止居住，因此进入栅门之前，使团只好露宿野外。在边境城市栅门有些人家，使团可以租赁一些房间解决住宿问题。从鸭绿江到辽阳的东八站，地形险恶，住宿条件也很差，进入辽东之后，情况逐渐有所好转，辽阳、锦州等大城市有按照惯例指定的住所，进入山海关之后，富裕的民宅比馆舍居住更加方便。辽阳、沈阳、山海关等地的古地图上绘有称为“朝鲜馆”的馆驿，据说是朝鲜使臣的馆舍，朝鲜使团也的确居住过。但是现在只能找到遗址，完整保留下来的建筑已无处可寻。



朝鲜使节燕行的路线

使团到达北京后居住在朝鲜馆,这个建筑原本位于玉河桥后面,被称为玉河馆。朝鲜馆中朝鲜人并不常住,只在使团居住期间使用,馆门则只在三使(正使、副使和书状官)进出时打开,平时关闭,只在侧面开一个使门,供使团一行人出入。

朝鲜使团在燕京(永乐元年改“北平”为“北京”)停留的时间,大体上在明朝时是40天,到了清朝可以延长到60天。这一期间,除了官方活动之外,使团成员可以以个人身份接触中国学者,访问书店和有名的地方,积极开展文化活动。例如,1765年北学派学者洪大容随书状官洪穰燕行,在北京停留62天,其中有33天和清朝学者进行交流,并寻访了书店遍布的琉璃厂和天主教教堂。洪大容把当时的见闻整理为《燕记》和《乙丙燕行录》。这些燕行录作为见闻录具有一定的价值,其中还详细记录了当时流通的知识和信息,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18~19世纪燕行录代表作

朝鲜对清交涉的部分成果就是朝鲜文人创作的300多部燕行录,这些资料最初被影印为《燕行录选集》(上下2册,韩国成均馆大学,1960),形成了“燕行录”这一学术概念,此后《燕行录全集》、《燕行录续集》(1~150册,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2008)和《燕行录选集补遗》(3册,韩国成均馆大学,2008)连续刊印,形成了朝鲜时代的文献群之一。其中18~19世纪的燕行录从1701年作者不详的《闲闲堂燕行录》到1890年洪钟永的《燕行录》,共有170多种流传于世。

在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洪大容的《乙丙燕行录》、朴趾源的《热河日记》等。金景善曾经指出这三部燕行录的特点如下:

“适燕者多纪其行,而三家最著,稼斋金氏、湛轩洪氏、燕岩朴氏也。以史例则稼近于编年而平实条畅,洪沿乎纪事而典雅缜密,朴类夫立传而赡丽宏博。”^①

金景善认为,这三部燕行录分别代表编年体、纪事体和传记体,金昌业的文字平顺踏实,条理分明,洪大容的文章典雅细密,朴趾源的记录文辞优美,内容丰富,知识渊博,三部作品都自成一家。

《老稼斋燕行日记》是1712年金昌业作为冬至使兼谢恩使正使的随员访问

① 金景善,《燕轅直指》,《序〈燕轅直指序〉》。

北京的记录,作者金昌业当时已是55岁高龄,但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大致而言,燕行记录都采取向朝廷报告旅程的报告形式,但是金昌业的北京之行没有正式的任务,因此他可以自由地进行记录。这一燕行日记是当时代表性的朝鲜文章大家对中国文物的观感记录,非常有趣,与《乙丙燕行录》和《热河日记》一起成为朝鲜后期燕行录的典范。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与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洪大容的《燕记》^①一起被称为朝鲜后期最高水平的北京纪行文,它采用纪传体的叙述方式,文辞华美,内容丰富。

洪大容燕行后留下了《燕记》和《乙丙燕行录》。1765年,他作为冬至使兼谢恩使书状官——叔父洪穉的随行军官开始了中国之行。他在北京停留了两个月左右,与中国学者潘廷筠、严诚、陆飞建立了友谊,对学术、历史、风俗等进行了讨论。他还前往天主教堂,接触到了西方的文物。对当时北学派学者来说,这种深入的访华体验还是第一次,他的燕行记录对后代的文人、学者有很大的启发。《湛轩燕记》没有采用日记体,而是按照不同的主题记录了燕行的体验,《乙丙燕行录》是一部长篇韩文纪行文,按照燕行的日期写成。此外,他的《杭传尺牍》主要记录了与中国知己的交游过程,收录了与中国好友的书信和在干净洞笔谈的情况。

《热河日记》是1780年朴趾源作为进贺兼谢恩使正使朴明源的子弟军官访问北京后撰写的燕行录。1780年6月24日,朴趾源从汉阳出发,10月27日回国,为祝贺清高宗的70岁寿诞,使团一行在中国盛京、北京、热河等地旅行后返回,与当地文人交游,体验了中国的文物制度,其过程都记载在这一燕行录中。《热河日记》的内容不仅涉及中国的山川、风土、文物、制度,还有历史、地理、风俗、考据、建设、人物、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学、艺术、古董,等等,被称为燕行文学之翘楚,受到朝鲜王朝各阶层人士的喜爱。

① 18世纪朝鲜文人洪大容所著的燕行录。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朱瑞平校点的《热河日记》。这本书收录了韩国实学研究大家——李佑成教授的序文及燕岩朴趾源先生事迹碑。

五、燕行录,会友的记录

燕行录堪称中朝名胜地游览记,也是古代朝鲜观察并接受先进文化的记录,同时又是古代文人对中国局势的观察和记录,此外,它也具有清朝和朝鲜文人交游记录的性质。朝鲜燕行使节有机会与中国文人直接见面并交流,因此在燕行录中描写了很多两国文人的交往,收录了他们的笔谈内容和唱酬的诗文。燕行使臣不仅在北京停留期间与中国文人相见,建立友谊,归国之后双方继续书信往来,保持联系。两国文人见面时,还互相介绍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通过燕行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人际关系网,进一步扩大了两国古代文人交流的广度。

两国文人的交游记录多存在于燕行录中,但是除了燕行录之外,文集和杂录中也存有不少他们相互唱酬的诗文和会友的记录,尤其是清朝文人非常重视与朝鲜使臣的交游,在文集等文献中留下了不少记录。如董文焕(1833—1877)从1861年起8年间一年不漏地记录了与朝鲜燕行使节见面、唱酬诗文及交游的过程,堪称其中的代表。

第三章

朝鲜燕行使节与清朝文人的交游

第一节 18 世纪朝鲜北学派的宿愿

一、琉璃厂的结缘与天涯知己：严诚与洪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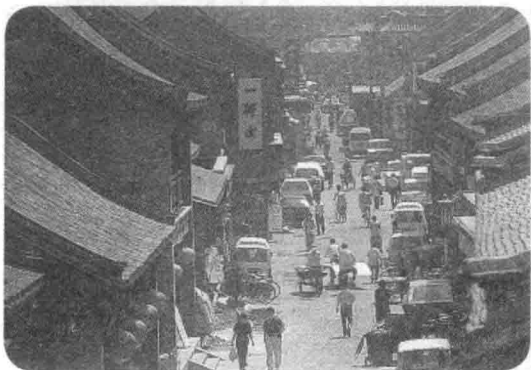
即便素养高深的中国当代学者也很少有人知道严诚(1733—1768)这个人,但与之相反,韩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很熟悉严诚,这是因为洪大容(1731—1783)与严诚之间的友谊在燕行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其事迹在韩国已经广为人知,特别是严诚与洪大容超越国境的友谊被韩国人奉为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典范。

1765 年,洪大容作为叔父洪穉的子弟军官来到中国,在北京琉璃厂遇到了杭州文人严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跨越国境的天涯知己。洪大容与严诚的直接交往不过是在两个月内见了七次面,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一交往却成为影响他们一生的传奇。

清朝乾隆年间,琉璃厂开始形成书画、古董市场,到了 18 世纪,琉璃厂书店和古董店林立,是北京的文物、书籍、书画的流通及交易中心,因此成为朝鲜使臣必去的地方。

继洪大容之后参与燕行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这样描写了这条文化街道,“琉璃厂在正阳门外南城下,横亘至宣武门外,即延寿寺旧址。……今为厂,造诸色琉璃瓦砖。……厂外皆店铺,货宝沸溢。书册铺最大者曰文粹堂、五柳居、

先月楼、鸣盛堂，天下举人、海内名士多寓是中。”琉璃厂既是当时文化的集散地，也是知识的源泉。来自朝鲜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购买各种书籍和文物，与五柳居等书店的主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使此地的书店成为中朝文化交流的中心。此外，琉璃厂之所以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还因为两国文人常常在这条街道上相识、相交。



洪大容与严诚相见的琉璃厂街道，
位于北京和平门

洪大容一行也是在琉璃厂结识了新的朋友。燕行之前，洪大容就明确表示自己的目的是交游，向燕京出发时他就多次吟咏《庄子》中的那句“夏虫不可语于冰，曲士不可语于道”，在《干净衚笔谈》的开头，他就说明，“自渡江之日起，所见皆为初见。然吾所愿者，得一心意相通之人纵情谈论而已”，他期盼着离开限制颇多的朝鲜，渴望在中国高度文明的广阔空间遇到伟大的文人。

虽然洪大容期待着遇到天下的文人，能够敞开心胸地纵横谈论，但是他当时并未决定将哪些人作为交游对象，与严诚的相识就是始于偶然。洪大容一行中的裨将李基成去琉璃厂买老花镜，在那里结识了两个清朝文人，这促成了洪大容与严诚的相识。

“乃请曰，我有亲识求眼镜，而市上难得真品。足下所戴甚合病眼，幸卖与我。足下则或有副件，虽求之亦当不难矣。其一人解而与之曰，求于君者，想是与我同病者也。吾何爱一镜，何用言卖？乃拂衣而去。基成悔其轻发，不可公然取人物，乃以镜追还之曰，前言戏耳，初无求之者。无用之物，不可受也。两人皆不悦曰，此微物耳。且同病有相怜之义。何君之琐琐如是？基成惭，不敢复言。略问其来历，则以为浙江举人，为赴试来，方僦居正阳门外干净衚云。”^①

① 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二，《杭传尺牋》《干净衚笔谈》。

李基成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洪大容。根据这两个人的言谈举止，洪大容认为这两个人都见识过人，于是决定去寻找他们，便租车沿着正阳门外的大路向南走了几里，进入西边的小胡同，看到了“干净衚”的牌子（如今这个胡同叫甘井胡同）。落座之后，双方互通了姓名，询问了年龄。

“严诚字力闾，号铁桥，年三十五，潘庭筠字兰公，号秋，年二十五。余曰，愚因李令公，得闻声华。且见朱卷，歆仰文章，谨仍李令与同志金生辄来请谒，望恕唐突。二人皆谢不敢。余曰，两位尊府在浙省何县？严生曰，同住杭州钱塘。余因诵楼观沧海日，严生继诵门对浙江潮。余笑曰，此即贵处耶？严生曰，然。”^①

洪大容吟出第一句诗，严诚就以下一句作答，一开始笔谈，两个人就发现心意相通。这首诗是唐朝诗人宋之问在钱塘江灵隐寺所作诗歌的第三、第四句，凡是对唐诗有一定造诣的人都能背诵得出来。但是通过应和，洪大容对严诚产生了好感，对方也对朝鲜很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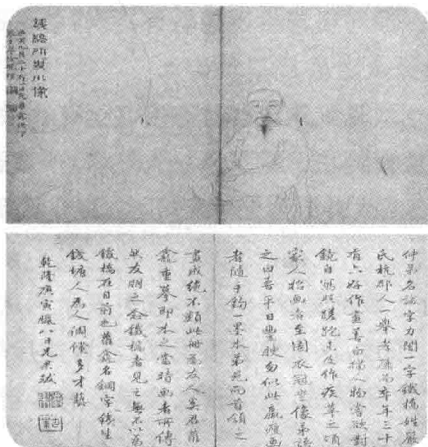
“潘生闻平仲之姓，问曰，君知贵国金尚宪乎？余曰，金是我国阁老而能诗能文，又有道学节义。尊辈居八千里外，何由知之耶？严生曰，有诗句选入中国诗集，故知之。严生即往傍炕持来一册子示之，题云感旧集，盖清初王渔洋集明清诸诗。而清阴朝天时，路出登莱，与其人有唱酬，故选入律绝数十首焉。余乃曰，我们此来，非偶然也。但初入中国，言语不相解听，请为笔谭。两人许诺，即铺纸砚于小卓上。”^②

出身杭州的科举考生竟然知道朝鲜文人金尚宪的诗，这让洪大容深感意外。因此，他认为这次相见绝非偶然，所以建议笔谈进行交流，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询问、了解，无法结结巴巴地用口语进行沟通。

此后，洪大容与严诚会面七次，每次都进行笔谈，交谈的内容也非常广泛，从清代的文化制度到儒家经典的含义、天人性命的根源、朱子与陆九渊的学术论争、进退与消长的征兆、出处与荣辱的分寸，等等，对学术、哲学的内容也进行了坦诚的讨论。

① 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二，《杭传尺牍》《干净衕笔谈》。

② 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二，《杭传尺牍》《干净衕笔谈》。



严诚的画像,是其朋友罗甘所画。洪大容曾描写说,严诚清瘦,骨骼粗大,英特峻洁,傲视世间。下图中的文章是严诚之兄严果写的跋文。

在与严诚的交流中,最为有趣的是他们对于朱熹与王阳明的讨论。朝鲜王朝对阳明学持禁忌的态度,因为洪大容恰好遇到了浙江省的文人,所以很自然地谈到了这个话题。

“余曰,王阳明亦浙人乎? 兰公曰,阳明绍兴人,与我同乡。余曰,绍兴距钱塘几里? 兰公曰,二百余里。余曰,贵处学者尊何人? 兰公曰,皆尊朱子。余曰,尊阳明者亦有之乎? 兰公曰,阳明大儒,配享孔庙。特其讲良知与朱子异,故学者勿宗。间有一二人,亦不甚著。余曰,阳明间世豪杰之士也。文章事业,实为前朝巨擘,但其门路诚如兰公之言。力闢曰,贵处亦辟陆耶? 余曰,然。力闢曰,陆子静天资甚高,阳明功盖天下。即不讲学,亦不碍其为大人物也。朱陆本无异同,学者自生分别耳。又曰,殊途同归。余曰,同归之说,不敢闻命。平仲曰,功虽盖天下,良知之创论,与朱岐异。兰公曰,事业须从诚意正心做来。阳明格物致知,尚有余憾耳? 余曰,阳明之学,尽有余憾。但比诸后世记诵之学,岂非霄壤乎? 兰公即打圈于岂非霄壤四字曰,极好。又曰,此时读书,不过记诵而已。然天下尽有潜心圣贤之学者,非俗儒之概例也。平仲曰,宗旨异致则反不如记诵矣。力闢微笑而已。盖其平日所学于王陆颇深也。”^①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严诚与洪大容对于阳明学有着不同的态度。严诚支持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学说,认为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目标是一致的,而洪大容站在正统朱子学学者的立场上,对阳明学持反对态度。因此,听到洪大容驳斥王

① 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二,《杭传尺牍》《干净衿笔谈》。